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2

理论、模型和方法:物理教育与福祉

优质体育教育的首要要素（参见图1.1)是课程、教学和学习。本章探讨了深入理解教育理论对于优化儿童福祉的重要性。Tracey和Morrow （2017)阐述了理论的重要性,指出专业人士在实践中开展教育和研究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理论驱动。Ewing也支持这一观点：“不同的意识形态或信念也会影响人们对知识和学习方式的理解。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不同的课程规划、评估和报告方法” （2010,第23页）。有观点认为,传统课堂教师在这方面存在局限性,缺乏对教育方法的兴趣或知识（Tracey & Morrow， 2017）。

人们提倡将理论与课堂（或运动场)实践相结合,这将加强课堂教学和研究，鼓励更广泛地运用各种方法,并选择最适合特定情境的方法（称为“教学法”）。与研究的教学法类似,教学法被定义为教学的艺术或科学（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 Tinning， 2010） ,它包含三个要素:学习、教学和课程（Kirk、Macdonald & O Sullivan， 2006）。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266-6_2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p. xi）。教育学与欧洲关于教学、学习和社会化的研究概念相似（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 2 页）。

理论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框架 一种人们可能意识到也可能没有意识到的视角。特雷西和莫罗将其描述为“基于信仰体系的解释,这些信仰体系通常得到广泛的研究和数据库的支持,并且往往被大量人群所接受” （2017,第3页）。“模型”与理论非常相似,这两个术语经常被互换使用。然而,有观点认为，“模型是用来解释和呈现理论的隐喻”（特雷西和莫罗， 2017,第4页）,是一套计划或程序（凯泽， 2001,第26页）。因此,在体育教育中,已经有很多模型被用来提供教学的“方案”（教学法）,从而代表了一种理论方法（廷宁， 2010）。

近年来,一些较受欢迎且较为流行的体育教育模式包括:基于“理解性游戏教学法”（TGFU,源自“理解性游戏”（Bunker & Thorpe， 1982））、 “游戏意识”（Dean Duyn， 1997）、“游戏实践”（ Lauder， 2001）、 “游戏概念教学法”（McNeill et al.， 2004）、 “体育教育”（Siedentop， 1994)以及Hellison的“个人与社会责任教学法”（TPSR） （2011）。Tinning将20世纪最主要的体育教育课程模式描述为:瑞典体操、运动教育、健康相关体能（HRF）、基础运动技能（FMS）、体育教育、TGFU和“游戏意识” （2010,第50页）。课程的理解主要取决于教学方法,需要考虑“课程的基础和领域、理论与实践以及参与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和差异”（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1页）。这一点在健康、工作和体育方面尤为重要,因为“课程对学校和社会的健康至关重要”（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 1 页）。Leahy、O Flynn 和 Wright 援引福柯的治理术来理解课程,将其视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实践性“文本” （2013,第 177 页）。

心理学视角

如前所述,理解如何实施高质量教育以促进身心健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探讨教育与健康的方法时,心理学视角也至关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知识理论框架得以理解。心理学视角为各种方法提供了认识论基础;因此,它们从根本上影响着教师的决策能力、法律和公共政策。

生物学视角

生物学视角关注大脑和神经系统,研究其可塑性和大脑结构。“这种方法旨在阐明行为和心理过程背后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Atkinson、Atkinson、Smith、Bem 和 Hilgard， 1990 年,第 9 页）。这种观点通过对老鼠、猫和猴子的条件反射,建立了有关学习、记忆、动机和情绪的知识。

行为视角

行为主义方法侧重于观察个体的行为,而非其大脑和神经系统。这一观点源于20世纪初美国心理学家约翰·B·华生（1878-1958）。华生认为,只有通过研究人们的行为,才能实现心理学的客观科学。追随华生的行为心理学家包括巴甫洛夫和斯金纳。作为行为主义的衍生学科,刺激-反应心理学“研究相关的刺激,以及伴随这些反应而来的奖惩”（Atkinson et al., 1990, p. 11）。

认知视角

现代认知视角“部分是对行为主义的反动,部分是对心理学认知根源的回归。与19世纪的版本一样,现代认知研究关注的是心理过程,例如感知、记忆、推理、决策和问题解决”（Atkinson等人， 1990,第11页）。在心理学教育中,这与信息加工模型（Lynch， 2017b)相关,该模型“强调……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习者内部认知加工的重要性”（Rink， 2010,第 24 页），并且与元认知有关（参见第14 章）。

与行为主义者不同,认知心理学家“认为你的行为是由你的期望和情绪决定的。认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认为,你基于已有的知识来记忆事物。你也基于对过去经验的记忆来解决问题” （http://mrmcnabb.weebly.com/5-major-perspectives-in-psychology.html）。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多年来深入研究儿童的认知发展,并提出了儿童思维和推理能力发展的四阶段理论。在体育教育中,了解儿童运动发展的进程同样重要；“运动控制是运动控制这一子学科中专门研究运动发展过程的领域,它描述和解释从生命开始到结束的这些变化”（Williams， 2014,第68页）。

精神分析视角

精神分析视角是由神经学家西格蒙德·

弗洛伊德通过结合以下几点：

> 弗洛伊德将当时关于意识、感知和记忆的认知观念,与基于生物学的本能思想相结合,构建了一套全新的人类行为理论。弗洛伊德理论的基本假设是,我们的大部分行为源于无意识的过程。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过程指的是人们自身意识不到但却会影响行为的信念、恐惧和欲望。（Atkinson et al., 1990, pp. 12–13）

禁止儿童的自然冲动会迫使他们脱离意识进入无意识，“在那里,他们会影响梦境、口误或举止,并表现为情绪问题、精神疾病的症状”（Atkinson 等人， 1990 年,第 13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现象学（人本主义)视角

现象学方法,也称为人本主义方法,关注主观体验 即个人对事件的个人看法。它旨在赋能个人,使其发挥自身最大潜能,实现自我实现。“我们是自己人生的建造者,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由行动者 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和设定目标,因此也应该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负责”（Atkinson et al., 1990, p. 13）。

教育方法

教育方法属于心理学范畴,并影响体育教育;这些方法包括行为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主义。
课程方法反映了教师对儿童如何学习以及儿童如何得到家庭、社区和教育者支持的看法（Arthur、Beecher、Death、Dockett 和 Farmer， 2015）。

行为疗法

行为主义教育法是历史最悠久的教育方法,也是目前最主流的教育方法。根据奥恩斯坦和亨金斯（2017)的研究,这种方法逻辑严密、指导性强,目标和目的都已明确列出;教学内容和活动也经过精心安排,以确保目标的实现。

“学习者在学习和取得成就的过程中,会因持续的积极强化而获得奖励”（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9 页）。
尤因（2010)描述了创始人之一拉尔夫·泰勒（1949)对行为主义课程方法的构想:一种线性的、循序渐进的教学模式,从设定目标开始,随后是学习体验,强调学习规定的内容,最后进行评估以检验目标是否达成。因此,学习由教师控制,知识被当作独立的学科来体验,学生的选择和互动很少（韦斯特布鲁克等人， 2013）。

行为主义方法一直受到批评 尤因质疑惠勒等行为主义理论家（1967,第11页）,他们的客观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行为主义被描述为有意识、有系统地计划改变行为的尝试。“从广义上讲,源于‘行为主义’的教学方法可能会导致诸如讲授、演示、死记硬背、集体重复、模仿/抄袭或‘大师班’等做法”（Westbrook et al., 2013, p. 9）。Ewing 以学习背诵河流名称为例,指出这是行为主义方法的典型特征,并认为这根本不是学习。“对行为主义的批评在于其所获得知识的表面性,以及‘一刀切’的方法排斥了具有个体差异的学生”（Westbrook et al., 2013, p. 9）。

体育教育与其他所有课程学习领域一样,历来采用行为主义方法。然而,如果体育教育要真正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就必须不断发展,使其更具整体性;也就是说,它不能再仅仅依赖行为主义方法。因为“这种手段-目的、目标导向的方法虽然简单,但同时也是其最大的局限。因为它无法考虑到教育中更为复杂和综合的目标和过程。”

（Ewing， 2010,第 27 页）。

然而,基于对人类最佳学习方式的研究,有观点认为显性教学是更优的教学方法。“我们应该教授特定领域的知识,而不是通用技能”，“在处理新信息时,初始指导应该是明确而直接的”（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125页）。以习得基础数学技能为例，“研究清楚地表明，教师指导的学习更为合适。毋庸置疑,学生必须牢固掌握这些基本技能,才能以任何程度的能力解决问题” （2014,第126页）。此外,行为主义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为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普适理论,适用于各种情境,既省时省力,又能节省资源,甚至对教师的资质和技能要求也较低”（Westbrook等人， 2013,第9页）。因此,行为主义方法受到商业和工业的影响，注重学校的效率,这通常意味着：

取消小班授课、提高师生比、减少行政人员聘用、降低教师工资、维持或减少运营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计算成本,然后制作图表来展示由此产生的成本降低……目标是将教学和学习简化为具有相应可衡量活动的精确行为。(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2页)

行为主义方法中蕴含着“功利主义”的理念,即“结果必须与工作相关,并有助于国家经济在日益严峻的全球环境中提高生产力”(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18页)。因此,行为主义方法与自上而下的指令密切相关,而这种指令在发达国家历史上往往并不成功。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澳大利亚就经历了这种情况,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Kirk，1990； Macdonald， 2003),结果导致改革未能实现(Lawson， 1990； Sparkes，1991)。目前,英国正在推行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主义政府方法,由教育、儿童服务和技能标准办公室(Ofsted)负责检查和监管。Ofsted为所有公立学校设定了共同的理想和期望,供其努力实现。自 2017 年以来,英国教育标准局 (Ofsted) 一直指出:

> ·他们的所有工作都以证据为基础。他们的评估工具和框架有效且可靠。 ·他们的框架公平公正。 ·他们的目标是减轻检查负担并降低预期。
>
> 研究结果清晰
> ·他们将时间和资源投入到能够直接带来改进的地方(https://www.gov.uk/government/organisations/ofsted/about)。

这一声明确实对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在2017年之前所期望的教育实践提出了质疑,当时的教育实践尚未以证据为基础。科菲尔德(Coffield)也支持这一观点,他代表英国教育研究协会(BERA)进行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英国教育标准局“目前弊大于利。尽管在其成立25年期间,其评估方法每隔几年就会有所改变,但这些方法仍然无效、不可靠且不公正”(Coffield， 2017)。

因此,莫兰认为“Ofsted 的权威从根本上就失效了” (2019)。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从历史上看,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检查和评估非常重视量化数据,例如二年级和六年级的国家课程标准化测试（简称SATs）。科尔宾曾谈到“SATs和这种极端压力测试制度给年幼的孩子们带来了噩梦” （2019）。

此外,有观点认为,自2010年以来,由于财政紧缩措施,英国的教育范围有所缩小,其唯一目的必须是服务于经济或商业（Corbyn， 2019）。定量研究是一种“旨在确定变量之间关系,特别是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Kervin、Vialle、Herrington和Okely， 2006,第36页）;因此,此类研究属于行为主义方法。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首席督学阿曼达·斯皮尔曼（Amanda Spielman)也支持这一观点,她在2017年6月23日举行的教育节上发表讲话时指出：

>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平衡问责体系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我们通过督导评估的内容可以抵消绩效排名表和最低标准带来的一些不可避免的压力。Ofsted的督导不应仅仅强化对数据的关注,而必须探究数据背后的原因,追问结果是如何取得的。因此,督导的意义在于深入了解,确保高质量的教育 真正满足学生需求的教育 不被损害。 (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manda-spielmans-speech-at-the-festival-of-education)

当斯皮尔曼谈到数据时,她指的是定量研究数据 成绩表和最低标准（例如SAT考试成绩）,其中“感兴趣的变量被非常清晰地阐明,测量是标准化的,结果通过统计方法进行分析”（Kervin等人， 2006,第36页）。这在教育领域令人惊讶,因为尽管定量方法的优势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非常适合科学研究（Kervin等人， 2006）,但定性研究提供的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见解才是世界各地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普遍采用的方法（Kervin等人， 2006； Lune和Berg， 2017； Merriam， 1998； Moran， 2019； Salkind， 2017）。定性研究最适合,因为“课程源于社会活动。它既是为了满足当前的需求,也是为了满足未来的需求。课程是一个动态的领域”（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 1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斯皮尔曼（Spielman)认为,定性研究方法“探索数据（定量数据)背后的含义,探究结果是如何实现的” （2017）。因此,它“能够深入了解教育情境中的微妙之处,并探索定量方法无法涵盖的意外情况”（Kervin et al., 2006, p. 37）。此外，“定性研究报告往往采用叙述形式,更容易被实践者理解…… 因此,研究结果更有可能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

（Kervin 等人， 2006 年,第 37 页）。

斯皮尔曼强调了定性数据方法的重要性：“明智地解读数据并将其置于恰当的语境中”。考虑到政策（课程)实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教师和学生（Gardner & Williamson， 1999）,定性研究方法最为合适,因为它们能够让参与者分享他们在学校环境中如何教授和学习课程（包括体育)的经历和宝贵见解。此外,教育领域的定性研究方法承认意义是社会建构的：“社会现实是由参与者在其社会环境中建构的”（Glesne， 1999,第5页）。

定性研究者通过数据收集、分析和报告来建立可信度和可靠性,而不是像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那样,仅仅关注定量研究方法中的效度、信度和普遍性（Kervin et al., 2006）。因此,Ofsted 一贯依赖定量研究方法,会限制其在学校内部的研究成果,因为它忽略了具体的背景和经验。这种做法假设英格兰的每一所学校、每一间教室、每一位教师和每一个孩子都是相同的;这与英国“每个孩子都很重要”的课程政策形成了悖论。因此,为了平衡研究结果并更深入地分析学校环境,Ofsted 也需要应用定性研究方法。正如 Kervin et al. (2006)所建议的,定性研究能够使研究成果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

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的标准由政府监督,其“将教与学简化为具有相应可衡量活动的精确行为”（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2页）,从而确保学校的效率。有人认为,这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方法和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英国,相关的资金削减措施彻底失败了(科尔宾, 2019 年;
Richardson, 2018a)。相关报告包括:

教师工作量增加,导致早期职业转变人数创历史新高。
教师离开教育行业(Corbyn, 2019; Coughlan, 2017a);
·教师承受工作压力的人数创历史新高,其中包括
抑郁和焦虑(Brennan & Henton, 2017; Corbyn, 2019;教育支持
伙伴关系, 2017);
·频繁的罢工威胁;以及沮丧的校长们纷纷离职
(Coughlan, 2017b; Richardson, 2018b)
·校长短缺(Walton, 2014);
·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流失到教育行业,导致
学校教师人数减少;不合格教师人数增加;
班级规模增大(Burns, 2018; Corbyn, 2019; Sellgren, 2017)。

由于英国教师短缺,初始教师教育
教师培训(ITE)正被速成且临时性的初始教师培训(ITT)项目所取代,这些项目耗费英国合格教师大量时间。
资格认证(QTS)已从传统的四年制学士学位缩短至
教育课程最短仅需 12 周,面向持有认可资格的候选人。
先前学习(https://www.tes.com/institute/assessment-only-route-qts)。因此,可以讨论教师培养的质量。
优质教育水平有所下降。
因此,英国被形容为“落后”和“停滞不前”。
根据经合组织测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世界排名,世界正在发生变化
(Coughlan, 2016)。
PISA测试每三年进行一次,来自70多个国家的15岁学生参加,测试内容包括数学、阅读和科学。英国排名第27位。
在数学方面,该校学生的参与率创18年来新低;阅读排名第22位;科学排名第15位。因此,政府致力于培养和控制“训练有素的教师”(行为主义方法),而不是强调……
“教育者”(建构主义方法)对……的信任度有限
职业发展。这一点可以从教师过度强调课堂进步的证据中看出,这导致教师工作量增加,进而导致……
会降低师生学习体验的质量(Corbyn,
2019)。正如PISA结果所示,这种方法效果不佳,甚至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与高质量的教育者与学生一起度过高质量的学习时间相比,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正如新加坡、香港（中国）、加拿大、芬兰和爱尔兰等国家所见（经合组织， 2019； PISA， 2015）。
科尔宾认为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并承诺“下一届工党政府将取消 7 岁和 11 岁儿童的 SATs 考试,并将取消对学前班进行新的基线评估的计划” （2019 年）。

建构主义方法

在建构主义方法中，“教育者认可‘主动学习’或‘游戏式学习’,儿童在情感、社交、生理和认知领域进行学习”（Arthur et al., 2015, p. 427）。本书采用“运动式教育”作为视角,来描述和倡导一种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整体方法 这一前提正是基于建构主义方法。此外，“儿童作为主动学习者,参与到使用开放式材料的综合实践体验中,并在体验中建构新的意义”（Arthur et al., 2015, p. 427）。

建构主义主要基于皮亚杰（1896-1980)的理论,认为“人的心智本质上是为发展概念和获取知识而构建的”。
（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10 页）。它涉及“个体学习者通过构建其现有的认知结构来积极探索他们的环境”（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10 页）。
建构主义方法注重过程而非最终结果,其理论基础包括布鲁纳（1960，1986)和斯滕豪斯（1975)等。 “它强调理解我们如何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学习过程本身必须经过精心计划和组织,以满足学习者的需求,并允许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学习”（加德纳， 1983;引自尤因， 2010,第29页）。

> 学习体验应当有意义且引人入胜,学习者必须理解所学内容的意义,因为实际上他们才是学习的主导者。虽然知识固然重要,但教师并非知识的传递者,而是学生的共同学习者和学习过程的引导者。（Ewing， 2010,第29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习者积极探索周围环境,以拓展其现有知识基础。体育教师必须具备学科内容方面的专业知识,才能提供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活动,帮助他们持续进步。因此,在建构主义教学法中,“以解决问题和项目为中心的个人和小组活动是合适的。具体活动优先考虑低龄儿童,而涉及符号和抽象思维的活动则留给高龄学生”(Westbrook et al., 2013, p. 10)。例如,在幼儿体育课中:

> 与社会文化教育方法一致,也与游戏式教学法类似,学习运动技能需要专家提供支架式指导,以帮助儿童掌握技能。支架式指导符合维戈特-斯凯最近发展区理论,而专家的指导可能涉及家庭和社区的合作。虽然任务最初对儿童来说可能具有挑战性,但如果儿童想要掌握这项技能,就应该让他们乐于定期练习。(Lynch, 2017b,第88页)

因此,如果教师了解学生及其兴趣,并在此基础上深入理解独特的学习情境,那么他们就能设计出学生乐于参与的学习体验。学生将“把所学知识与自身生活联系起来”(Ewing, 2010,第29页)。建构主义方法也与教学研究相关。

Quennerstedt 和 Larsson (2015)引用了捷克学者和教师教育家约翰·阿莫斯·科梅纽斯(John Amos Comenius) 的经典著作,他在 1657 年写道,教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找到一种教学方法,使教师可以少教,但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成为更少的噪音、厌恶和无用劳动,而更多的休闲、享受和坚实进步的场所”(第 4 页;引自 Quennerstedt & Larsson, 2015,第 2 页)。

社会建构主义一词也被使用,它意味着知识是社会建构的,学习是一个社会过程。意义建构优先在熟悉的语境中进行,并借助文化工具,特别是语言(Westbrook et al., 2013, p. 10)。教师运用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当任务对孩子来说太难时”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能够独立完成,但在更有知识的人的帮助下是可能的”(Arthur 等人， 2015 年,第 431 页）。

1999年昆士兰州（澳大利亚)1至10年级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以建构主义为基础,倡导探究式教学方法,旨在培养学生的解决问题和决策能力（并与元认知能力相联系）。之所以选择这份课程文件,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都是当时领先的健康、工作与体育（HPE)课程文件。尽管2013年11月发布了新的全国性HPE课程,但人们发现,最新的澳大利亚全国性HPE课程与1994年HPE国家声明和概况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而后者正是1999年昆士兰州HPE（P-10)课程大纲的制定基础。

教学大纲（Lynch， 2017a）。

研究表明,探究式教学模式是一种成功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框架,可指导教师设计教学单元（Lynch， 2016）。该模式的迭代循环包含四个阶段:理解、计划、行动和反思。1999 年昆士兰州 HPE 课程促进了终身学习,具体表现为:

·知识渊博、理解深刻的人； ·思维复杂； ·富有创造力； ·积极主动的调查者； ·沟通能力强； ·参与相互依存的世界； ·善于反思和自主学习（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 1999 年,第 5 页）。

作为相互依存世界中的一员;

学习者培养对自身、他人和环境福祉的责任感。他们通过以下方式理解社会正义原则:

·了解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和观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规划方法并培养技能以纠正不平等现象（昆士兰州）
学校课程委员会， 1999 年,第 3 页）。

因此,建构主义“与所谓的21世纪终身学习密切相关”（澳大利亚政府， 2014年,第125页）。21世纪终身学习技能包括：

·沟通能力 ·计算能力 ·信息通
信技术能力 ·思维能力
和问题解决能
力 ·自我管理能力和竞争能力 ·学习和工作能力 ·
社交能力

·身体技能 ·审美
技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9 年）。

建构主义教学法的例子包括项目工作、个人活动、体验式学习、美国和欧洲的蒙台梭利教育、施泰纳教育和裴斯泰洛齐教育、美国的互惠式阅读教学、交际学习、合作学习以及国家战略中的小组工作要素（Westbrook 等人， 2013 年,第 12 页）。

批判性方法

> 批判教育学起源于巴西的保罗·弗雷勒（Paulo Freire,1972），旨在追求更完整的人性、社会解放和变革,而这一切都由“受压迫者”（例如穷人和妇女）引领。这是一种对话式、反思式的教学方法,教师不再是权威,而是作为知识分子,引导学生培养对自身所受压迫的批判意识,并在学习的过程中采取行动,从而改变世界。（Westbrook et al., 2013, p. 11）

尤因借鉴哈贝马斯（1984）的理论,将批判方法描述为：“力求超越简单的因果关系或过程导向的强调” （2010,第30页）。学生也“承担教学责任”。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与老师和整个小组一起参与学习过程”
（2010,第31页）。合作经验和个人经验都很重要。
并会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不同。教师负责提供支架式学习。实际上,课程包含了所有经验。
发生在特定背景下（Pinar， 1975）。
在这种方法中，“竞争性考试和传统学术”
这些科目被认为会加剧不平等,并且带有偏见
来自优越背景的学生”（澳大利亚政府， 2014 年），
第20页）。自由人文主义观点也根植于批判之中。
这种方法明确区分了培训和教育,并基于这样的信念:前者致力于技能培养,而后者则侧重于技能提升。
以及面向功利目的的能力,而另一种能力则与之相关。
凭借知识和理解” （澳大利亚政府， 2014 年,第 11 页）
20)批判性教学法的例子包括批判性教学法,例如英国的儿童哲学和学生哲学。

声音（Westbrook等人， 2013,第12页）。Leahy等人（2013)指出，
1999年昆士兰州HPE（P-10)课程大纲中采用的探究式教学方法
该方法被重新命名为“批判性探究”方法,作为2013年澳大利亚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五大核心原则之一。此外，
他们认为,批判性方法影响了教育思维,进而塑造了健康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发展。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的体育教育
英国。

哪种方法?

奥恩斯坦和亨金斯认为,在考虑教育和……时，
特别是课程内容涵盖了这一点,那就是没有确切的答案。
应该采用哪种方法,这是有意为之（2017,第1页）;它是
关于增进对围绕这一问题的复杂性的理解。他们认为,学校确实倾向于专注于某一特定方面。
尽管许多教育工作者并不采用这种方法，“相反,他们强调一种方法”。
在某些情况下采用某种方法,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提倡其他方法”
（Ornstein & Hunkins， 2017,第2页）。这就是为什么它如此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课程设计者、课程专家、课程专业的学生和教师需要不断加深对这方面的理解。

在澳大利亚最新的课程改革评估中,鼓励教师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正如林奇（Lynch,2014)所倡导的那样。奥恩斯坦和亨金斯（Ornstein and Hunkins ,2017)也支持并强调了教学情境的重要性。因此，教育的目的是实现所有教学方法的融合：

1. 培养实用技能,提高生产力（实用性）。
2. 为未来做好准备并应对未来（21世纪学习）。
3. 培养孩子（个性化学习）。
4. 批判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
5. 向学生介绍人类思想和言论中最优秀的部分（灌输-
（澳大利亚政府， 2014 年,第 24 页）。

所有方法都有其用武之地,循证研究表明,不应存在某种方法（及其所包含的教学法)凌驾于其他方法之上的情况。然而，“地理、历史和科学（以及健康、体育和体育)的课程都优先考虑探究式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而这些教学方法都属于建构主义范畴（澳大利亚政府， 2014,第5页）。

参考

Arthur, L., Beecher, B., Death, E., Dockett, S., & Farmer, S. (2015).幼儿教育机构的规划与设计（第6版）。南墨尔本,维多利亚州:Cengage Learning。

Atkinson, RL, Atkinson, RC, Smith, RE, Bem, DJ, & Hilgard, E. R. (1990).心理学导论。伦敦: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出版社。

澳大利亚政府。(2014)。澳大利亚课程审查:最终报告。摘自https://docs.education.gov.au/system/files/doc/other/review_of_the_national_curriculum_final_report.pdf 。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Brennan, C. 和 Henton, G. (2017 年 9 月 18 日)。英国各地教师的工作压力“令人难以承受”。BBC新闻家庭与教育。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41280360 。

Bruner, J. (1960).教育过程。纽约:Vintage出版社。

布鲁纳,J.（1986）。现实的心灵,可能的世界。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按。

Bunker, D. 和 Thorpe, R. (1982)。中学游戏教学模式。 《体育教育公报》， 18(1),5-8。

Burns, J. (2018年6月28日)。官方数据显示,教师人数为2013年以来最低。BBC新闻家庭与教育。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44648438 。

Coffield, F. (2017).支持和反对OFSTED的研究证据。检索自https://www.bera.ac.uk/blog/the-research-evidence-for-and-against-ofsted。

Corbyn, J. (2019 年 4 月)。杰里米·科尔宾在2019 年东北大学年会上发表讲话。检索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htN0TK5VPg&feature=youtu.be&link_id=2&can_id=1988b23a77ad25b098ae27af6aab9ba0&source=email-conference-breaking-news&email_referrer=email_529215&email_subject=conference-nil-breaking-news

Coughlan, S. (2016年12月6日)。PISA测试:英国在全球学校排名中落后。BBC新闻家庭与教育。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38157811 。

Coughlan, S. (2017a 年 2 月 21 日)。议员们表示,教师短缺问题日益严重。BBC新闻家庭与教育。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39028840 。

Coughlan, S. (2017b 年 2 月 22 日)。校长因学校资金危机辞职。BBC新闻家庭与教育。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39057276。den Duyn, N. (1997). 《游戏意识:培养思维型球员工作手册》。堪培拉: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教育支持伙伴关系。(2017年9月18日)。教师面临的压力损害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福祉。检索自https://www.educationsupportpartnership.org.uk/about-us/press-centre/pressure-teachers-damaging-mental-health-and-wellbeing 。

Ewing, R. (2010).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南梅尔伯恩,维多利亚州:牛津大学出版社。

Gardner, C. 和 Williamson, J. (1999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杯与唇之间有很多失误……: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教育政策实施的案例研究。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澳大利亚墨尔本。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Gardner, H. (1983).心智框架:多元智能理论。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

格莱斯内,C.（1999）。成为质性研究者:入门。悉尼:
艾迪生·韦斯利·朗曼。

哈贝马斯,J.（1984）。交往行为理论（第一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
按。

Hellison, D. (2011).通过体育锻炼教授个人和社会责任
活动（第 3 版）。伊利诺伊州香槟市:Human Kinetics 出版社。

Kervin, L.、Vialle, W.、Herrington, J. 和 Okely, T. (2006)。教育工作者的研究。
悉尼:汤姆森社会科学出版社。

Kezar, A. (2001).理解和促进 21 世纪的组织变革:最新研究和概念化。ASHE -ERIC 高
等教育报告,28(4)。旧金山:Jossey-Bass。

Kirk, D. (1990). 学校知识和课程包 作为文本。课程研究杂志,22,409–425 。

Kirk, D.、Macdonald, D. 和 O Sullivan, M. (2006)。体育教育手册。伦敦:Sage 出
版社。

Launder, AG (2001).游戏实践:游戏式教学与指导方法
体育。伊利诺伊州香槟市:Human Kinetics出版社。

劳森,H.（1990）。超越实证主义:研究、实践与本科生教育
专业教育。Quest ,42,161-183 。

Leahy, D., O Flynn, G., & Wright, J. (2013). 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批判性“批判性
探究”的提议。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4 (2),175-187。

Lune, H., & Berg, B. (2017).社会科学定性研究方法（第9版）。纽约州纽约市:
Pearson Educational Leadership。

Lynch, T. (2014).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 II:健康与体育教育(HPE)。欧洲体育教育评论， 20(4),508–524。
https ://doi.org/10.1177/1356336X14535166 。

Lynch,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伙伴关系优化儿
童的健康和福祉。
伦敦: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67-3。

Lynch, T. (2017a). 体育教师如何成为健康与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与社会， 22(3)，
355–376。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2017b). 体育教育:通过运动和运动技能发展儿童的健康和福祉。载于 S.
Garvis 和 D. Pendergast (编),儿童健康与福祉（第 2 版,第 77-94 页）。墨尔本，
维多利亚州:剑桥出版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麦克唐纳,D.（2003）。课程改革与后现代世界:是否
学校课程改革运动是否过时了?课程研究杂志， 35(2),139-149。

麦克尼尔、MC、弗莱、JM、赖特、SC、Tan、WKC、Tan、KSS 和 Schempp，
PG（2004）。“在本土语境下”:新加坡游戏教学面临的挑战
关于实践。体育、教育与社会,9,3-32 。

Merriam, S. (1998).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在教育中的应用:
根据教育案例研究修订和扩充。旧金山:Jossey-Bass出版社。

Moran, L. (2019年4月)。Layla Moran:三件小事。检索自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FYOO5vul-ro&feature=youtu.be&link_id=3&
can_id=1988b23a77ad25b098ae27af6aab9ba0&source=email-conference-
breaking-news&email_referrer=email_529215&email_subject=conference-nil-
breaking-news。

经合组织。(2019)。英国学生表现（PISA 2015）。检索日期:
来自http://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lotter=h5&primary
国家=GBR&阈值=10&主题=PI。

Ornstein, AC 和 Hunkins, FP (2017)。课程:基础、原则、
以及相关问题（第 7 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培生教育领导力出版社。

Pinar, W.（编）。（1975）。课程理论:重构主义者。伯克利:
麦卡琴。

PISA。 （2015）。英国。检索自https://www.compareyour
country.org/pisa/country/GBR?lg=en。

昆士兰州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健康与体育教育
1至10年级课程大纲。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教育厅。

Quennerstedt, M., & Larsson, H. (2015). 体育教育实践中的运动文化学习。 《体育、教育与社
会》。https ://doi.org/10.1080/
13573322.2014.994490。

Richardson, H. (2018a年3月31日)。学校因“资金灾难”而裁员。BBC新闻家庭与教育频道。检索自
https://www.bbc.com/
新闻/教育-43569389。

Richardson, H. (2018b年3月31日)。教师支持全国罢工的可能性
薪酬过高。BBC新闻家庭与教育。检索自https://www.bbc.
com/news/education-43604858。

Rink, JE (2010).体育教学促进学习（第6版）。波士顿:
麦格劳-希尔。

Salkind, NJ (2017)。探索研究（第9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Pearson教育领导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Sellgren, K. (2017年5月2日)。议员称教师招聘面临“重大挑战”。BBC新闻家庭与教育。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education-39778479 。

Siedentop, D. (1994).体育教育:通过积极的体育体验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伊利诺伊州香槟市:Human Kinetics公司。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 N. Armstrong & A. Sparkes (编),体育教育问题(第1-19 页)。伦敦:卡塞尔教育出版社。

Spielman, A. (2017年6月23日)。Amanda Spielman在教育节上的演讲:Ofsted首席督学谈到课程审查以及认识到领导力挑战和重视管理的重要性。检索自https://www.gov.uk/government/speeches/amanda-spielmans-speech-at-the-festival-of-education。

Stenhouse, L. (1975).课程研究与开发导论（修订版）。伦敦:Heinemann。

Tinning, R. (2010).教育学与人体运动:理论、实践、研究。Routledge体育教育和青少年运动研究。纽约:Routledge出版社。

Tracey, DH, & Morrow, LM (2017).阅读视角:理论与模型导论（第3版）。纽约:吉尔福德出版社。

Tyler, RW (1949).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则。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19)。什么是SPN 21?检索自http://planipolis.iiep.unesco.org/sites/planipolis/files/ressources/brunei_darussalam_spn21english.pdf 。

Walton, L. (2014年6月21日)。校长招聘“日益困难”的警告。 《星期日政治》东北和坎布里亚。检索自https://www.bbc.com/news/uk-england-27946799 。

Westbrook, J., Durrani, N., Brown, R., Orr, D., Pryor, J., Boddy, J., & Salvi, F. (2013).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师教育。检索自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05154/Pedagogy-curriculum-teaching-practices-education.pdf 。

Wheeler, D. (1967).课程过程。伦敦:Hodder & Stoughton 出版社。

Williams, BJ (2014)。人体运动和运动技能。载于 S. Garvis & D. Pendergast（编）， 《儿童时期的健康与福祉》 （第 61-72 页）。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剑桥出版社。